

# 嘉约翰与早期博医会

郑维江 刘远明

**【摘要】** 1886 年,欧美在华医学传教士发起组建中国近代首个医学社团——博医会,并公推嘉约翰为首任会长兼会刊《博医会报》首任主编。嘉约翰时任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已在华行医传教 30 多年,是中国以至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医学传教士之一。他的巨大声望和远见卓识,对早期博医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嘉约翰; 医学传教士; 博医会; 博医会报

**John Kerr and the early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ZHENG Weijiang, LIU Yuanming (corresponding author). School of Health Management,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182, China

**【Abstract】** In 1886, the Euro-American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founded the first modern 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and John Kerr was elected as the first chairman and the first editor-in-chief of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John Kerr, who had done missionary medical work in China for thirty years, was then the director of Canton Hospital, and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China and even all over the world. His great prestige and foresight and sagacit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Key words】** John Kerr; Medical missionary;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 1. 首任博医会会长与《博医会报》主编

19 世纪 30 年代,由于马礼逊、郭雷枢、伯驾等人的实践,行医作为一种有效的传教手段逐渐被欧美新教海外传教机构认同,医学传教士也成为医生职业的亚类。1838 年 2 月,伯驾(Peter Parker)、郭雷枢(Thomas Colledge)和裨治文(Elijah birdgman)等人在广州发起成立全球第 1 个医学传教组织——中华医务传道会。它是一个介于宗教与医学之间的医疗慈善机构,以筹集资金和医药物品为主要功能,并兼作早期来华医学传教士的中介服务机构。

2 次鸦片战争期间形成的条约制度,为医学传教空间的扩展创造了条件。伴随自由传教时代的来临以及来华医学传教士人数的迅速增加,医学传教活动逐渐出现了行医与传教的两极分化。在此背景

下,1886 年时任上海同仁医院院长的美国医学传教士文恒理(H. W. Boone)在《教务杂志》倡议成立“中国教会医学会”(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中文简称“博医会”),并推举时任广州博济医院院长嘉约翰为首任会长和会刊《博医会报》首任主编。尽管博医会仍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但其宗旨将促进医学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置于首要位置,且强调入会者的医学专业资格或背景;尤其关键的是它建立了以《博医会报》、年会为核心的学术研究与交流平台,这充分表明它是一个医学社团。

嘉约翰(John Kerr,1824—1901)1824 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邓坎斯维尔,1847 年毕业于费城杰弗逊医学院,此后在俄亥俄州南部行医 7 年。1853 年,他受美国长老会之任命前往中国,1855 年接替伯驾掌管新豆栏眼科医院。次年,新豆栏眼科医院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夷为平地,1859 年嘉约翰择址重建,取名“博济医院”,并一手将其打造为当时国内以至远东第一流的教会医院<sup>[1]</sup>。博医会创建时,嘉约翰年过花甲,已在华服务 30 多载。在

此期间,他以精湛的外科技术诊治了成千上万的中国病人;创办了中国近代第 1 所西医学校——博济医科学学校;亲手翻译大量的西医书籍;创办中国近代最早医学杂志——《西医新报》。这些辉煌业绩,使嘉约翰成为当时中国以至全球范围内具有极高声望与影响力的医学会传教士之一。因此,他当选博医会首任会长兼会刊首任主编,可谓实至名归。嘉约翰任职时间为 1887—1888 年,此外,他还担任过博医会名词委员会主席、禁烟委员会主席、华南分会会长及会刊华南分区编辑。他的巨大声望和远见卓识,对早期博医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2. 探索行医与传教的平衡

“医学传教士”(Medical Missionary)是“由差会派遣或雇佣的医生,他们领取差会工资,自愿将医疗工作和差会利益联系在一起”<sup>[2]</sup>。通俗地说,医学传教士就是端教会饭碗的医生,他们扮演医生和传教士双重角色,在医治病人肉体的同时拯救他们的灵魂。从产生之日起,医学传教士双重角色的冲突与错位就一直是个挥之不去的问题。对此,杨念群在《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在中国本土的结构性紧张》一文中进行了详细剖析。他认为,从宗教社会的理念看,医学传教士这一角色是西方理性裂变的域外表现,是基督教体系服从于西方权力话语对非欧世界进行边界界定的附生产物。在异质的中国文化中,医学传教士在如何使中国人界分“宗教”与“科学”的功能、分辨医学传教士行医与传教的双重角色等方面陷入了困境。中国巨大的医疗需求,使来华的医学传教士普遍陷入繁忙的医务活动中,从而悄悄改变了以传播基督福音拯救灵魂为第一使命的原始动机,把对肉体的治疗视为首要责任<sup>[3]</sup>。

博医会成立前后,围绕行医与传教的关系,医学传教士内部曾展开激烈的论争。以德贞为代表的激进派认为,利用医学手段拓展传教通道、消除偏见只是暂时性的,是被设计出来的亮点,工具性的医学传教并不具备永恒价值与普世意义。在自由传教的时代,没有必要将行医和传教继续捆绑在一起<sup>[2]</sup>。以马根济为代表的正统派,则义无反顾地强调医学传教士的双重角色,认为减轻身体的痛苦和救助精神上的贫困都是基督教徒的职责,这 2 大职责对医学传教士具有同等约束力。马根济在《医学传教的福音传播方面》一文中,严厉责斥了一些医学传教士以没有时间、精力为借口逃避传播福音的责任,并归

纳了医学传教士必须重视福音传播方面工作的 4 大理由:①它可以感染和影响医院的病人;②它能够成为医院其他职员效仿的样板;③它是医学传教士这一职业的内在组成部份;④它是医学传教士精神生活的内在需求<sup>[4]</sup>。温和派的代表人物玛高温、约翰斯顿等人基于医学传教士是受宗教机构派遣这一现实,原则上认同医学传教士有传教的责任,但主张其有限的精力应放在医疗服务方面。具体到医院或诊所的工作,医学传教士主要负责治病。虽然医学传教士本人应尽可能利用与病人接触的机会传播福音,但医院内的布道工作最好交给牧师去做。用现今流行的话语说,医学传教士通过医疗活动为传播基督福音搭台,而唱戏的主角则是专门布道的牧师。

嘉约翰作为博医会的首任会长,立足于学会的生存与发展,努力寻求行医与传教关系的平衡。在他看来,把行医作为传教的一种有效手段,或者把医疗活动视为宗教慈善活动的重要部分,的确是欧美宗教机构扶持医学的主要动机,但这绝不意味着宗教外在于医学。事实上,宗教信仰、理念本身就是医学的内在需求,即使医学传教士这一职业消失,医学也依然需要宗教。

1890 年,博医会首次大会在上海举行,嘉约翰向大会作了题为《医学传教士与医生职业之关系》的主题报告,全面阐述了其观点。他认为,医乃仁术,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医生不仅需有高超的技艺,而且需有良好的品德。他应敬畏生命,给疾病患者人性的关怀。正是宗教赋予了医学博爱与仁慈精神,支撑其人文向度。基于病因学的视角,嘉约翰将人类社会的一系列疾病归之于人们道德的堕落或行为失范,例如紊乱的性关系导致梅毒,酗酒、吸食鸦片烟等恶习引发神经官能症等等。类似疾病的控制不可能单凭技术手段,而需要价值观念的引导。宗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有助于人们形成良好、健康的生活方式<sup>[5]</sup>。嘉约翰生活的时代,生物医学模式已开始崭露头角,它强调影响疾病的生理因素以及对疾病的技术控制。但嘉约翰依然固守灵魂与肉体不可分割的传统观念,并从医学伦理学、社会医学等视角论证包括宗教在内的社会因素或手段对疾病治疗与预防的重要性。以现今的眼光看,他的观点极具前瞻性。

嘉约翰将医学传教士归入医生这一行列,甚至将它视为医生职业群体的一个高贵与特殊的阶层。他主要是基于医学而非宗教的立场论说行医与传教

的关系,把宗教信仰与伦理视为医学职业的内在需求,强调宗教可以约束人们不良行为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它对调和早期博医会内部矛盾、凝聚力量以及获得欧美宗教机构对博医会的支持,无疑有积极作用。

### 3. 打造高品质的会刊

中国近代最早的西医期刊,是 1871 年 8 月由海关医官贾米森(Alexander Jamieson)主编、以英文出版的《海关医报》,半年集刊。它是清末中国海关关册《海关公报》的一部分,旨在记录中国通商口岸的疾病种类、数量及其与当地气候、风土、生活习惯的关系。该刊一直持续到 1904 年 3 月,共计 67 集。此外,据医史学家王吉民先生考证,1880 年,嘉约翰曾主编发行《西医新报》,季刊,专为华人而设,报共 8 页,大号杂志格式,有封面和目录,全属中文,仅出了 8 期。1885 年,中国人尹端模主编发行《医学报》,月刊,但只出了 2 期<sup>[6]</sup>。因此,1887 年创刊发行的《博医会报》与《海关医报》是当时中国仅存的 2 种医学期刊。由于早期博医会会员较少、经费短缺,其主要工作是《博医会报》的出版发行与医学名词的统一。因此,博医会负责人对《博医会报》自然高度重视,前几任会长嘉约翰、文恒理、莱尔、杜思莱特、阿特伯里等人均曾兼任会刊主编或编辑。

关于《博医会报》的办刊方针,文恒理在 1887 年创刊号上发表的《博医会未来的工作》一文作了大致描述:“《博医会报》是散布中国各地医学传教士相互联络的一条纽带,是集思广益、交换心得的平台,它将报道中国各省的地质矿产、动植物、食物供应以及气象和自然地理等状况;调查探讨主要疾病及其流行的原因,介绍各地诊所与医院的工作”<sup>[7]</sup>。作为《博医会报》的首任主编,嘉约翰全权负责 1987 年第 1 卷、1988 年第 2 卷的编辑发行工作。此后直至 1901 年去世,他都是会刊的主要编辑之一。从会刊目录看,早期《博医会报》开设的主要栏目为:社论、公告、论著、医院报道、学会报道、福音传播、会员信息,等等。受嘉约翰有关行医与传教关系态度的直接影响,其中行医与传教之关系、在医院或诊所传教之方法、教会医院的自养等内容占有相当大的篇幅。

毫无疑问,要创办和维持一种高品质的医学期刊,不仅需要充足的经费,而且还需要高质量的稿源。但早期博医会会员较少,而且多为临床医生,

科研能力弱,缺乏给医学期刊撰写论文的经验。加之为《博医会报》撰稿纯属义务,无分文报酬,因此,会员普遍缺乏热情。为此,嘉约翰、文恒理等人曾多次呼吁会员把为会刊撰稿作为一种责任,要求会员每年至少为会刊提供 1 篇文章,但结果并不理想。为解会刊无米之炊,确保其高品质,主编与编辑人员不得不亲自撰稿,嘉约翰堪称表率。据统计,从 1887 年创刊至 1896 年的前 10 卷中,嘉约翰本人就撰写了 15 篇文章或报告:

从内容看,文章涉及了疾病研究、医学教育、福音传播、医院自养等方面,与办刊方针高度吻合。当然,就一份医学杂志而言,最具价值的无疑是疾病研究方面的内容。嘉约翰是一位极具医学研究素质的临床医生,尤其是位外科圣手,擅长膀胱结石切除与碎石术,被誉为这一领域的世界一流专家。其相关学术论文主要涉及上颌骨切除术、各类结石切除术与碎石术等方面。从行文看,他高度关注同期欧美国家的外科进展,经常阅读《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等国际一流医学期刊。值得一提的是,1894 年夏,穗港鼠疫爆发,嘉约翰不仅积极参与了广州的防疫工作,而且在同年的《博医会报》对此次鼠疫进行了研讨,其敏锐的研究意识由此可见一斑。受嘉约翰的感染,当时博济医院的谭约瑟、富马利、赖马西等医学传教士也成为了早期《博医会报》的主要作者。

### 4. 倡导西医本土化教育

1890 年博医会首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医学教育,时任会长文恒理以《中国的医学教育》为题向大会致辞。他高度赞扬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伯驾、合信、德贞、嘉约翰等医学传教士在医学教育方面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但同时认为,师徒制和分散、孤立的小规模医学学校已不适应西医在中国快速发展的需要。因此,各差会应联合起来,实现医学教育资源的整合,创办正规化的、大型的医学院。他强调医学教育的规范化和培养大批本土西医人才是西医能否在中国生根的关键所在,并呼吁与会代表就联合办学、学制、教材和教学用语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sup>[8]</sup>。

嘉约翰是中国近代西医教育由师徒制向学院制过度的标志性人物,1866 年,他创办了中国近代第 1 所西医学学校——附属博济医院的“博济医科学校”,开始对中国学生进行西医系统化教育。1879 年,博

济医院正式设立博济医科,规定学制 3 年,同时招收男女学生,学习期满后需进行临床实习。因此,嘉约翰对如何在中国开展西医教育有比一般医学传教士更为丰富的经验和更为深刻的认知。早期医学传教士培训本土学生的直接目的,是为教会医院或诊所提供药剂师、护士等等助手。嘉约翰并不否认这种做法的动机和效果,但他同时认为,要使西方理性医学在中国全面传播,关键在于培养一大批能自行开业的本土西医人才。因此,教会医学院校应可能向那些有志学习西医且有经济自助能力的普通中国青年人开放,而不应以他们是否具有基督教信仰作为入学的前提条件。本着这一理念,嘉约翰进一步明确了教会医学教育的 3 大目标:①为一般民众造就才学俱全的中国医生;②造就教会医院的医生;③造就医学教师<sup>[9]</sup>。显而易见,嘉约翰把培养大量本土西医人才以推动西医在中国的全面传播视为医学传教士的一种使命,认为这并不妨碍教会从中选拔优秀本土人才为其服务。这种西医教育的本土化取向,当然需要与中国政府与社会进行互动式合作,这成为早期博医会致力追求的一个目标。

对于采用什么样的教材和教学用语问题,当时医学传教士的主流观点是:应尽可能采用欧美医学院校使用的规范教材,教学用语自然也应以英文为主。这显然是一种医学精英教育路线,其逻辑在于有利于与世界医学接轨,确保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但嘉约翰对于这一问题,却有独到的认识。他认为,培养的大量本土西医人才,主要以普通中国大众为服务对象,不能想象他们在诊疗过程中,使用英语的医学名词与概念与病人进行沟通。因此,最好是应用中文进行教学,嘉约翰主管的博济医校就是以中文教学为主,据说他有时甚至用广东方言进行医学教学。

按照嘉约翰本人多年的教学经验,许多本土年青人选择学习西医,主要是想把它作为谋生的一种手段。由于这些人大多不能花几年的时间去完成正规的学制课程,因此,对他们的培训应以临床诊疗技术为主。如果一味照搬欧美医学院校的规范教材而不结合当地的实际,无异于纸上谈兵,这对学生将来独立开业行医帮助不大。从 1859 年翻译出版西医

著作《论发热与疟》起,嘉约翰在尹端模、林湘东、孔庆高等本土西医的协助下,共计翻译、编辑出版医书 34 种,多作为博济医校的教材。由于广东是亚热带流行病、眼病、皮肤病的多发地区,嘉约翰特选择编译了《眼科撮要》《炎症》《热症》《皮肤新篇》《花柳指迷》等相关书籍作为教材。

与西医书籍翻译和本土化教育相关联的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医学名词的统一与标准化。博医会成立前,嘉约翰就是翻译西医书籍最多的在华医学传教士之一,也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1871 年,他在翻译出版《药理学》时便附录英汉对照的名词术语表。此后,他曾指导博济医院的汤姆逊医生编译《中英病保词汇》(1887)和《英华医学名词》(1889)<sup>[10]</sup>。1890 年博医会举行首次大会期间成立了名词委员会全权负责医学名词的统一工作,委员会由嘉约翰任主席,成员包括高似兰、亨特、多斯怀特、波特等人。虽然这一工作的实质性进展应归功于高似兰等人,但嘉约翰无疑是最早、也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

#### 参 考 文 献

- [1] 嘉惠霖. 博济医院百年[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120
- [2] 高晞德. 德贞传[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74,105.
- [3] 杨念群. 西医传教士的双重角色在中国本土的结构紧张[J].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5):122-147.
- [4] J. K Mackenzie. The Evangelistic Side of A Medical Mission[J].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87(1):5-8
- [5] J. G Kerr. Medical Missionaries in Relation to the Medical Profession[J].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990(3):87-100.
- [6] 虎门人民政府. 王吉民中华医史研究[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368-371.
- [7] H. W. Boone. The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of China; It's Future Work [J].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87(1):1-5.
- [8] H. W. Boone. Medical Education for Chinese[J].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0(3):109-114
- [9] J. G Kerr. Training medical students[J]. The 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Journal, 1890(3):122-125.
- [10] 邓铁涛,程之范. 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350.

(收稿日期:2016-08-31)

(本文编辑:王振瑞)